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

方汉奇 等 著



《大公报》百年史

DAGONGBAO BAINIAN SHI
(1902-06-17 — 2002-06-17)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

方汉奇 (主编)

吴廷俊 涂光晋

陈昌凤 王 鹏

吴 葆 彭 兰

陈彤旭 史媛媛

宋 晖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方汉奇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ISBN 7-300-05231-2

I. 大...

II. 方...

III. 大公报—新闻事业史—1902—2002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938 号

《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

方汉奇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239	(出版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7.625 插页 2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9 00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DAGONGBAO BAINIANSHI

前言：再论大公报的 历史地位^{*}

□ 方汉奇

(一)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6月17日，到2002年的6月17日，已经出满了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是全世界惊涛骇浪变化多端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摆脱屈辱和贫困、寻求发展和振兴道路的一百年。在这个极不寻常的一百年中，

^{*}2000年为纪念《大公报》创刊98周年，曾写过一篇3000字左右的短文，题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是在上述的那篇短文的基础上重写的。篇幅为前文的五倍，题目也另定为《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

《大公报》经历了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个历史时期。几番浮沉，数易其主，却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由僻处华北一隅之地的报纸，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在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间，她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民族的苦难，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她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惟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

在中国的报坛上，《大公报》具有崇高的声望，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中国新闻界的重镇。1919年巴黎和会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惟一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联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中国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有关情况的内地记者，都来自《大公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派有记者长驻欧洲报道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向香港同胞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也是《大公报》。1991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不仅为《大公报》设了专门的词条，还为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范长江等12位《大公报》人设了专门的人物词条。近代以来，中国涌现过数以千计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有幸作为人物辞条入选这部国家级百科全书的只有108人，《大公报》竟占了其中的九分之一，可见其受重视之一斑。

《大公报》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她有较高的品位和质量。从英敛之时代起，《大公报》就是一份由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主办的报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人接办以后，更时刻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文人论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的传统。从两汉、宋代的太学生，明代的东林党，清季讲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和经

世致用之学的魏源、薛福成、冯桂芬，到戊戌维新前后从事办报活动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无不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难免有忠君的思想，但也会有扶正去邪、反对奸佞、固本富国、与民休息等内容，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的健康力量。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论政既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也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既希望政治清明，国家富强，也要求当政者广开言路，俯顺舆情，同样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主要属于后者。一个以文人论政为标榜的报纸，自然会爱惜自己的声誉，摒弃低级趣味，重视社会效益，注意报纸的品位和质量。

《大公报》之所以受重视，还因为她是一个重视报格、严于律己的正派的报纸。《大公报》名称中的“大”和“公”两个字，就是这种报格的具体体现。英敛之对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并以此作为办报的宗旨。这一宗旨，始终为各时期的《大公报》事业的继承者所服膺，薪火相传，坚持不懈。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后，又由张季鸾出面，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称“四不”）的社训。据张季鸾自己的解释，所谓“不党”，指的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指的是“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所谓“不私”，指的是办报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他图”；“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指的是不“随声附和”，不“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此后不久，为约束报社工作者的行动，他还提出了以下四点作为补充，即：“不锦上添花，不落井下石，不与人共利害，不参与别人的秘密。”不论旧的“四不”还是新的“四不”，都是一个负责任的报纸的严格的自律行动。应该指出的有两点，即：（1）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如所谓“不党”，从广

义来说，就是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所说的“君子不党”的那个“不党”。意思是坚持不结党营私和无所偏倚，能够站在比较超脱的立场上为老百姓说话。从狭义来说，则是对民国初年以来，一些报纸投靠国会中的某一个党团，或封建军阀中的某一个派系，靠津贴过日子，党同伐异，盲目吹捧，信口胡诌，造谣生事等种种行为的鄙夷和抵制。(2)他们确实是在身体力行的。同样以“不党”为例，在张季鸾等人主持时期，《大公报》始终是一个无党派的报纸。他们不仅自己不参加党派，也不允许报社内的工作人员参加任何党派，连参加一般的社会团体也在禁止之列。天津版外勤课主任汪松年曾一度被当地基督教青年会拉去担任征集新会员的征友队队长，胡政之知道后立即让他辞职，就是明显的一例。为了坚持以上的办报原则，《大公报》曾经多次被查禁而其志不改。这些，都说明《大公报》确实是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正派的报纸。

正因为如此，《大公报》从一创刊起，就受到了社会的瞩目和尊重，得到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这家报纸后来能够得到世界新闻界的承认和国际新闻学界的关注，被授予“最佳新闻事业服务奖”，影响由国内及于国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惟一获得国际荣誉的报纸，也和她的上述特点不无关系。

(二)

周恩来总理1958年在和当时《大公报》的负责人费彝民谈到这家报纸的历史贡献时，曾经肯定了三。点。其中的第一、二点就是“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这两点其实是一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就是“爱国”的具体表现。检阅一百年来《大公报》的言论主张，有一点可以肯定，即爱国思想始终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不论是英敛之时期还是英敛之以后的各个时期，《大公报》的忧国忧民之心和强烈的爱国思想，都表现得十分突出。

《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是满族人，和皇族还有一定的姻亲关系，而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这些都不妨碍他是一个真正的爱

国者。他之所以要创办《大公报》这份报纸，也许有众多考虑，但企图以言论振兴中华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他支持维新变法，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要求发展经济，整顿吏治，这些都是他爱国的具体表现。他最初爱的也许只是“大清国”，因此力图维护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反对以暴力手段推翻爱新觉罗王朝，这是他的局限。但当时的“大清国”，是以汉满蒙回藏为首的众多民族和四万万同胞爱国思想的共同载体。在鼎革以前，爱大清就是爱自己的国家。两者之间并无矛盾。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其爱国的感情是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的改变和政权的更迭而有所轩轻的。英敛之就是这样的爱国者。在他的主持下，不论是在清末的那段时期，还是在民国初年的那段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中始终都洋溢着爱国的感情。1903年，她反对沙俄军队强据我辽东半岛和觊觎我东北地区的筑路权。1904年，她强烈谴责英属南非当局虐待我华工。1905年，她积极参加由反美华工禁约引起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成为天津地区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1915年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她是坚决反对的。此后不久段祺瑞内阁以出卖主权为代价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英敛之退出《大公报》以后，这家报纸一度为亲段的安福系财阀所控制。但在负责编辑和采访工作的总编辑胡政之的具体主持下，这家报纸仍然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与帝国主义损害中国利益的活动所进行的抗争作了及时的报道，对“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在吴张胡主持的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爱国思想主要表现在她的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上。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个人都是留日学生，继张季鸾主持笔政的王芸生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对中国觊觎和侵略的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数以百万字计的有关中日交涉历史的专著。他们都是对日本情况十分了解的爱国知识分子。出于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

计和对形势的分析，他们曾经有过“不轻于主战”和“缓抗”的主张。这些都属于对抗日时机和策略把握上的考虑。“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后，他们都义无反顾地立即成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公开主张“和日阀撕拼”，“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不胜不止”（见胡政之为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所作的序）。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抗战到底的态度始终十分坚决，言论中没有一个字对抗战的前景发生动摇。1937年12月13日，占领上海的日军新闻检查机关发布通令，要求在租界出版的所有报纸自12月15日起将新闻小样送检。《大公报》上海版于先一天断然停刊，以示抵制，并发表社论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公报》香港版被迫停刊，胡政之在社论中引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以言志，并表示“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悲壮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黔战役，桂林沦陷，寇氛直逼贵州的独山，《大公报》又多次发表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日和“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表示了不满，并要求惩治御敌不力的将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为了共赴国难，曾经五次播迁，津、沪、汉、港、桂等馆的资财设备，全部委弃，荡然无存。工作人员则和难民们一起，辗转道路，流离失所，历尽艰险，逃回后方。没有在敌人统治下办过一天报。重庆版虽然相对稳定，但也曾遭到过敌机毁灭性的轰炸，被迫迁址重建。一家无权无勇没有得到过当局任何资助的民办报纸，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如此坚定地毁报抒难，如此执著地在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出报，克尽言责，为振奋抗日精神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舆论上的鼓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在张季鸾逝世后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曾经称赞张“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这既是对张个人抗日言行的肯定，也

是对《大公报》整个报纸的抗日爱国思想的肯定。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之所以受到她的读者，特别是那些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民族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喜爱和支持，和她的爱国宣传，和她在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全国上下团结抗日等方面所起到的舆论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1948年复刊的《大公报》香港版，在20世纪的后半叶，继承了英敛之时期以来的《大公报》的爱国传统，使《大公报》爱国思想的这条主线，一直贯彻延续到今天。在香港和海内外读者的心目中，《大公报》始终是一份深受尊重和喜爱的爱国报纸。

(三)

周恩来总理对《大公报》的历史贡献特别肯定的还有一点，就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一点说得非常中肯。《大公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群英荟萃的一家报纸。她不仅集聚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新闻工作人员。

《大公报》之注意人才，是有传统的。英敛之筹办《大公报》之初，首先考虑的就是人才。为了组织好办报的班子，他曾多次到报纸较多人才较为集中的上海，为即将创刊的这家报纸物色掌门人。他曾一度考虑把曾任《时务报》和《昌言报》主持人的汪康年请来当主笔，汪是当时中国新闻界极负声望赫赫有名的人物。只是双方的条件没有谈妥，才作罢。继英敛之之后接办《大公报》的王郅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至关重要的一步棋，就是抓住了胡政之。失去了胡政之这个人才，他的报纸也就难乎为继了。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的新记公司成立后，不仅注意延揽人才，也十分注意培养自己的人才。在他们主持的时期，《大公报》群星璀璨，熠熠生辉，可以称得上是这家报纸人才辈出的鼎盛时期。

首先，这三个人，特别是其中的张季鸾、胡政之两个人，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人才。张季鸾从晚清起就开始办报，民国成

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就是他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秘书的时候，从南京发给上海各报的。此后，他为多家报纸担任过主笔，写得一手好文章。曾经以文字贾祸，两人牢狱。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后，他“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潇洒，儒雅，宽厚，大度，才思敏捷，举重若轻，是富有民族感情的一代报人。他的文章风格，成为《大公报》的代表，不仅影响了他的侪辈和他的后继者，也风靡了他所在的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总理在他逝世后给家属的唁电中，尊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毛泽东也曾经在和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们的谈话中，称赞他作为一家报纸总编辑，指挥若定游刃有余的风度和才华。胡政之则是一个新闻事业的全才和新闻工作的多面手。作为一个杰出的记者，他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的采访，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善于发现线索，捕捉战机，分析判断也很准确。作为一个熟练的编辑工作者，他对报纸编辑工作的各个环节都十分在行。各版新闻的编辑调度，各种栏目的组织策划，他都优为之。作为一个杰出的报刊政论家，他有很好的文史根底，笔力雄健，意简言赅。所写社论，因为不署名，和张季鸾的几乎难以分辨。担任《大公报》总经理后，工作重点转到报纸的印刷、发行、广告、营销等方面，又充分地显示了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才干。《大公报》的好几个版，特别是目前还在出版的香港版，都是在他的指挥擘画下创办起来的。其对《大公报》的贡献和在中国新闻界的影响，并不下于张季鸾。

其次，他们也十分注意延揽、吸纳和培养人才。继张季鸾之后主持《大公报》笔政、写得一手激情洋溢的好文章的王芸生，就是在和张季鸾打了一个时期的文字交道之后，被后者延揽到《大公报》来的。当时他是天津《商报》的总编辑。继王芸生之后被延揽进《大公报》的，还有原任天津《庸报》总编辑的张琴南，原任北平《晨报》编辑的许君远，原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记者的费彝民，原任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的蒋荫恩，以及原任北大助教的张佛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公报》的方面大员和骨干力量。除了从同业中延揽人才外，他们也注意从社会上其他行业的工作人员和刚毕业

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可造之才，以练习生的名义，录取下来，加以培养。

张胡两人都很讲究用人之道。他们的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不拘一格。王芸生出身茶叶铺学徒，没有多高的学历，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没有多少新闻工作的经历，一旦被发现是人才，就都立即委以重任。二是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三是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外加车马费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四是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了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既避免了让第一线的人受到伤害，因而缩手缩脚，也使被保护者心生感激，更加发奋工作。五是注意教育和培养。每一个新手，都给他们提供条件和机会，在发挥他们的个人专长之余，要求他们能够掌握“写”、“跑”、“照”、“论”等各方面的技能，兼通经理、编辑两部门的业务，成为新闻事业的各方面的行家里手。这些用人之道，既有助于人才的成长，也增加了团体的凝聚力，使《大公报》始终拥有一支精干的团结的有着很强战斗力的队伍。

在张胡等人的提携和培养下，《大公报》为中国新闻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仅列名《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的，除吴、张、胡三人和前引的王芸生、张琴南、许君远、费彝民、徐铸成、梁厚甫、张佛泉等人外，还有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杜协民、汪松年、孔昭恺、何毓昌、杨历樵、赵恩源、李天织、马季廉、王文彬、张警吾、萧乾、艾秀峰、范长江、杨刚、孟秋江、李侠文、李纯青、徐盈、彭子冈、朱启平、曾敏之、谭文瑞、陆诒、唐振常、季崇威、吕德润、张高峰、严仁颖、李光诒、潘际垌、陈凡、黄克夫、马季良（唐纳）、陈文统（梁羽生）、查良

鏞（金庸）、严庆树（唐人）、高元礼、章丹枫、马廷栋、周雨、苏济生、王浩天、张契尼、戈衍棣、吴砚农、罗承勋、蒋逸霄、方蒙、左步青、沈春波、赵泽隆、寿充一、戴文葆、刘克林等 60 多人。他们都出于这一时期的《大公报》，都属于“国家级”的“新闻界名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专家，有的是经验老到的编辑能手，有的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名记者。其中范长江、杨刚、萧乾、彭子冈、朱启平、吕德润等人，早在 20 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蜚声于时。范长江采访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以《中国的西北角》为名结集出版后，曾经七次再版。朱启平 1945 年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现场采写的著名通讯《落日》和 1979 年访问西欧四国时在戴高乐墓前采写的著名通讯《伟大的平凡》，都传诵一时，并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性篇章。

经过《大公报》提携和培养的上述人才中，有一些人不仅为《大公报》做出了贡献，离开《大公报》以后，在新闻界和其他领域仍然表现出色，不断做出新的贡献。徐铸成接办了《文汇报》，并长期担任该报的领导工作，晚年著述等身，成为著名的老报人；许君远接任了重庆《益世报》的主笔，成为深受推重的办报能手；范长江创办了著名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解放后主持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后来又负责科委的工作，成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管理部门的领导人；蒋荫恩担任了燕京大学新闻系的主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副系主任，成为著名的新闻教育家；梁厚甫长期为海外华文传媒撰写评论，成为著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金庸长期在香港报刊上撰写连载小说，又长期主持香港著名报纸《明报》的笔政，成为著名的武侠小说家和报刊活动家；杨刚担任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主任秘书，成为周总理处理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助手；刘克林参加了中宣部的工作，文字铿锵激昂，成为“九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唐振常潜心于史学研究，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萧乾晚年致力于翻译工作，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并荣任有“翰林院”之称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他们的这些成就，固然由于个人

的努力，但也与他们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和《大公报》对他们的教育和熏陶有着一定的关系。他们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大公报》输送给其他报纸和其他行业的人才。

经过《大公报》教育和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除了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很强的业务能力之外，一般都还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敬业精神。“一笔在手，胸中要有亿万人民，万不得已时，可以不写，不能打诳。到战场采访，工作第一，生命第二”。这是朱启平1993年逝世前说过的话。这不仅是他个人的信念，也是《大公报》培养出来的新闻工作者共同的心声。它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敬业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的精神财富。

(四)

《大公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她为同时代的同业们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之初，这家报纸在天津人的心目中并无地位，发行数字也不高。由于他的努力，不到五年的功夫就使《大公报》成为天津地区举足轻重的大报，他自己也因而被推为当地报业公会的主席。吴、张、胡联合主持的新记公司成立后，这个报的发行量最初还不到2 000份，每月亏损4 000余元，一年后增至6 000份，才闯出亏损关，取得收支平衡。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她已由天津一个版，扩充为天津、上海、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六个版。还得到过一次国际奖。抗日战争时期，她的重庆版曾经发行达97 000份，创大后方一家报纸单独发行量的最高纪录。抗战结束后，她的上海天津重庆香港四个版总发行量达20万份，总资产达到60多万美元。香港版还被当地《年鉴》推为“香港舆论的重镇”。这些都说明，她是中国新闻史上办得非常成功的一家报纸。

《大公报》之所以办得非常成功和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前述的人才济济和经营得当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由于她在编排和内容上严肃认真，肯下功夫。

从版面的安排来看，《大公报》历来重视要闻版的编排。新闻

力求真实准确。标题字斟句酌，很能抓住中外新闻的重点。头版头条标题的制作尤为经心，每天都能给读者以深刻印象。其他新闻的重轻次序，也安排得比较妥当。

从内容看，《大公报》的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都极具特色，被称为当时新闻界的“四绝”。

首先是社评。《大公报》既然以“文人论政”为标榜，代表报纸出来“论政”的“社评”，自然受到重视。新记公司以前的时期，通常都由报社主人和主持笔政的人亲自动手。英敛之、胡政之等，都曾为该报写过不少社评。新记公司接办初期，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都把社评的写作看做当天报纸工作中的头等大事。从题目到观点都经过共同商量，然后由其中一人动手，最后由担任总编辑的张季鸾定稿。吴鼎昌退出后，主要由张季鸾、胡政之两人执笔，以张写的居多。按照他们事先约定的“事业前进，个人后退”的原则，这些社评多不署名。这种做法，在张季鸾逝世后，曾经给编辑出版他的那部《季鸾文存》造成困难。因为三个人都接受过梁启超的影响，“笔锋常带感情”，文风非常接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张季鸾进入晚年，体弱多病，继承他的衣钵成为撰写《大公报》社评主力的是王芸生。王芸生深得张季鸾的真传，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社评写得有才气，有骨气，有锐气，激情洋溢，江河直泻，很能引人入胜。和王芸生同时期为《大公报》各版撰写社评的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等人，个个都是嫉恶如仇满腹经纶的好手，使得《大公报》的社评，从内容到文字，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受到读者的重视和称赞。

其次是星期论文。《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起始于1934年1月，旨在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提供发表自己“评论”的园地。星期论文的内容不限于“论政”，也包括学者们有创获的学术研究成果。应邀为这个专栏撰稿的先后有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都是一时之选。该专栏极大地提高了《大公报》的文化内涵和知名度，成为《大公报》的一个名牌专栏。和星期论文相配合，《大公报》还有意识地开辟过一些供学者们发表学术文章的专

栏。钱钟书的《休漠的哲学》、《为什么人要穿衣》，费孝通的《重访英伦》、《乡土重建》等不少有分量的鸿篇巨构，就是在《大公报》所特辟的这些专栏上发表的。星期论文和这些学术专栏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知识分子读者，也提高了《大公报》的社会地位，扩大了她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

再次是新闻通讯。张胡等《大公报》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新闻报道。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来的许多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包括张勋复辟、马厂誓师、巴黎和会、蒋冯阎大战、“九·一八”事变、救国会“六君子”被捕，以及徐州会战、中原重灾等，一旦发生，《大公报》都立即派出记者到现场采访。许多采访活动，都出于张胡的亲自指挥。“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晚上，胡政之接到张学良用暗语给他的电话通知后，立即派记者连夜搭车赴沈阳，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现场。1933年蒋介石由江西北上处理张学良下野问题，张季鸾得知后，立即派出记者持他写给蒋身边的秘书长杨永泰的亲笔信，在定县火车站等候蒋的专列，闯进车厢，跟踪采访。同年，商办的新绥长途汽车首次客车将由绥远省城归绥（今呼和浩特）开往新疆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当时最新最快的人疆路线和交通工具，张季鸾立即派记者随车同去，以便及时报道沿途运行情况和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的有关情况。在新闻报道上，《大公报》不吝重金不惜小费。为了萧乾去欧洲的采访活动能够成行，胡政之不惜出了双份的路费。第一份被萧不小心弄丢了，随即再补发一份。为了及时获得太平洋作战前线盟军军事进展的情况，《大公报》曾多次多渠道派出随军记者。从各个不同的路线随盟军进驻日本，参加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仅有的三个中国记者中，就有两个来自《大公报》。对于一些突发性新闻的报道，《大公报》主要利用专电。对一些持续时间较长的又需要有一定深度的报道，则主要利用新闻通讯。在张胡等领导的新记公司时期，新闻通讯成为《大公报》的一大特色，不少系列报道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某一重大战役或事件的新闻通讯，如曹谷冰采写的关于中苏建交后苏俄国内情况的系列通讯，陈纪滢采写的关于沦陷后的东

北地区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范长江采写的有关红军长征和红军到达陕北地区后的有关情况的系列通讯，萧乾采写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战局和战后国际关系问题的系列通讯，吕德润采写的随中国远征军入缅印地区作战情况的系列通讯，以及陈学昭的旅欧通讯，杨刚的旅美通讯等，都写得情文并茂，很有深度，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刊载这类通讯的专栏，也成为《大公报》的又一名牌专栏，受到读者的欢迎。

最后是副刊。从天津版起，《大公报》就十分注意副刊的编辑工作，沪港渝桂等版陆续创刊后，副刊尤其受到重视。在萧乾、杨刚等几位副刊主编的主持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发表过不少进步的文学作品，也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作家。陈白尘的著名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和《偶然论在上海》等曾经轰动一时的作品和文章，都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杨绛的第一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也是在《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的。这个副刊还设立过文艺奖金。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卢焚的《谷》，都曾在评选中得过奖。由于办得出色，她同样为《大公报》吸引了一大批读者，成为报纸众多版面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新闻史上继著名的“五四”时期“四大副刊”之后的又一个著名的报纸副刊。

此外，《大公报》还注意贴近读者，服务社会，热心公益事业，曾多次为各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发起募捐。除办报外，还组建过以报纸名字命名的剧团和篮球队，举行过公演和参加过全国性的比赛，把报纸上发表过的有影响的社评、通讯、漫画作品和个人的文章结集出版，公开发行。在人事上执行编辑记者定期交换的制度和由编辑部出身的人担任经理的制度等等。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都取得过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提高了报纸的知名度和工作的效率，也有助于人才的成长。她在这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的办报经验，应该被视作中国新闻界共同的精神财富，